

北大中文文库

吴组缃文选

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和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贬暗褒”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

吴组缃 著 / 刘勇强 编选



吴组缃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文库

吴组缃文选

吴组缃 著 / 刘勇强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组缃文选/吴组缃著;刘勇强编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北大中文文库)

ISBN 978-7-301-17872-0

I. ①吴… II. ①吴… ②刘…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163 号

书 名: 吴组缃文选

著作责任者: 吴组缃 著 刘勇强 编选

责任编辑: 徐丹丽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872-0/I · 226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8.5 印张 265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

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前 言

吴组缃先生是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史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文学实践中,吴先生的文学思想、创作和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史学科的构建同步。而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研究中,吴先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一方面,在与时俱进中力争思想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又在强大的社会潮流中,努力保持和彰显独立的精神追求与学术人格,这正是吴先生文学研究最具活力的地方。

一 文学的使命意识与小说家的眼光

吴先生的创作以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著称。早在1930年代初他还在清华大学求学时,他就在《斥徐祖正先生》、《谈谈清华的文风》等文章中,强调了文学作品必须反映出时代和社会。吴先生的这种文学使命感毫无疑问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但他的认识并非一般的盲从,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化现实的切身感受。事实上,具有与吴先生一样使命感的作家在当时并不少见,但比较而言,吴先生更主张、也更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从普通人的命运中,揭示时代的脉动。

重视文学对时代、社会的使命意识与作品的现实意义,是吴先生创作的原则,也是他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标尺。而吴先生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又有高超的创作经验,恰是他能将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文学感悟及睿智的理论思辨结合起来,从而在文学史学科建设过程中,阐述不同流俗学术见解的前提。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学作品的“主题”探讨是一个研究热点问题,吴先生认为:

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它的主题思想必然是从它所描写的客观现实生活里提出来的内在的问题,而决不是任谁的主观偏见成

见从外部强加到作品内容上去的概念或说教。^①

正是这样的思想,引导他从文学作品的实际内容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关联中,发掘作品的精神内涵。相反,对“主题”与现实疏离的描写,吴先生是不以为然的。实际上,早在40年代的《关于〈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吴先生就秉持这样的思想,对茅盾的一些作品“主题”有所批评。50年代初写的《谈〈春蚕〉》,全面分析了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把他对茅盾的追踪评论作了一个总结。除了继续高度评价茅盾小说深刻的社会意义,吴先生对其作品中某些脱离生活的描写仍持批评意见。例如,他指出《春蚕》中作为小说关键情节的老通宝盲目扩大养蚕,违反了生活的真实。而这种不真实,不但影响了人物的性格,也伤害了作品的思想。就茅盾的具体作品而言,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吴先生的批评,至今仍值得我们汲取的,是那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

吴先生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也是如此。50年代初,为配合教学,他写出了《谈〈阿Q正传〉》、《说〈离婚〉》两篇宏论。在前一篇论文中,吴先生指出阿Q的形象并不是一个思想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具有那种思想概念的人物的类型或标本。相反,阿Q是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这当然是对将阿Q视为类型或符号人物观点的反驳。吴先生还认为这部作品的结构,实际就是作品中的故事所表现的内在的矛盾斗争的发展的形式。这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不少人都说吴先生的研究特点是作家型的,这是不错的。但仔细想来,又稍嫌笼统。因为作家也是有不同风格的,作家治学当然也会由此形成不同个性。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吴先生与何其芳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分歧。

上个世纪50年代,吴先生与何其芳先生同时从事《红楼梦》的研究与教学,也形成了不同看法。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认为宝钗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而吴先生却认为薛宝钗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有

^① 《对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一点理解》,《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很明显的市侩习气,一些行为表明她算不得“淑女”,而作者对她也有讽刺的意味。

下面我们就看看吴先生是如何分析宝钗的。吴先生首先提到“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琐屑问题”,即薛宝钗一家进京的住处。他指出,薛家是皇商,很有钱,在京城开有店铺,也有房子,娘家王子腾家,也住北京。可是薛进京,一不住自己的房子,二不住娘家,却住到外亲(姨亲)贾家来,这是不合常情常理的,也就是说必定另有原因。再从贾府来看,薛家入住后,先是被安排在梨香院,后来采买了12个小女戏子,又让薛家迁到东北角的一处房子去住了。贾家的这一安排对薛家来说至少是失礼的。可是薛家并不感到屈辱,没有生气,还是赖在贾家不走。这也说明薛家必有不搬出的深曲隐衷。那么,薛家进京有什么理由呢?作品写了四条。其中第一条是送宝钗进京候选,此外就是探亲、整理店务(销算旧账、再计新支)以及游览上都风光。吴先生分析说,在封建社会,寻常百姓家的女儿都不愿意送到宫里去做宫女,而宝钗却主动进京候选。曹雪芹这一笔,就是贬了薛家,把他们市侩主义的实质点出来了。因为当时薛家这个豪门正走向衰落,迫切需要寻求政治靠山,需要“富”与“贵”的结合。薛蟠是不成器的,只能靠宝钗。不但如此,住进贾府,又使宝钗与宝玉的婚姻纠葛关联到一起了,这也是此一琐屑细节的意义。

当小说正面描写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时,宝钗的一些表现在吴先生看来更算不上所谓“淑女”。他指出,如果是“淑女”的话,像宝钗这样的人,应该成天与李纨、迎春、探春、惜春等人在一起才是,但小说却描写宝钗总是跟着宝玉转,每当宝玉、黛玉在一起时,总是“一语未了,宝姑娘来了”。而在第二十二回以后,精明的宝钗发现争取上边的支持更重要。这一回,描写贾母因喜爱宝钗的“稳重和平”,要给她做生日。而宝钗也开始有意识地讨好贾母等人。贾母要她点菜,她就点老太太爱吃的甜食;要她点戏,她就点吉利热闹的戏。元妃出灯谜让大家猜,明明很简单,她偏装猜不着。特别是元妃送端午节礼物,给宝玉与宝钗送的东西一样,都是一挂红麝串。宝玉问:“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很明显,这份礼物

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有暗示订婚的意思。宝钗平素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这次却不然,把这串礼物戴在身上。吴先生指出,如果宝钗真的是一个淑女的话,拿到这样的礼物应该是害羞的。况且当时正逢炎夏,宜于戴翡翠、玛瑙之类饰物,戴红麝串并不舒服。所以,宝钗显然有得意、炫耀之意。吴先生并不是说宝钗没有追求宝玉的权利,而是说宝钗不必嘴上一套,心里又是一套,因为这牵涉到人品的问题。《红楼梦》描写过宝钗金蝉脱壳、移祸黛玉,这样的事就不是很光明磊落了。小说中还写到,她主动提出要送燕窝给黛玉补身子,吴先生认为这一手也有些阴损。黛玉、宝钗同是贾府客人,黛玉有什么要求,应由主人去解决。宝钗的行为突出了黛玉的有病、麻烦,而这正是寄人篱下的黛玉所担心的。^①

对于自己与何其芳先生的分歧,吴先生曾戏言,何其芳是诗人,习惯用理想化的眼光看世界,把人都看得那么单纯、那么好;而自己是小说家,小说家的眼光往往是剖析的、批判的,所以会把人看得很坏。^②就宝钗的性格而言,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吴先生的诛心之论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从生活体验出发得出这一认识的,着眼于人物的基本性格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特点。尽管读者不一定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但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部古代小说在吴先生面前,并不是呆板的陈述,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更为可贵的是,吴先生的这种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并不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感想。在对生活的体悟中,吴先生总是通过缜密的思考将深切的体会提高到理论的层面,从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这才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效法的地方。

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个薛宝钗的形象,综观吴先生的论著,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人物形象的分析上,而这与吴先生作为一个小说家对人物描写的重视是分不开

① 吴先生有关薛宝钗形象的分析,见《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一文,《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笔者曾亲聆吴先生提到这一看法,其他师长也间有叙及此事者,如张锦池的《忆恩师吴组缃教授》,见《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的。他在1941年写的《如何创作小说中的人物》一文中说：

什么是写小说的中心？我个人以为就是描写人物（他的人和他的生活）。因为时代与社会的中心就是人。没有人，就无所谓时代与社会；没有写出人物，严格的说，也就不成其为小说。把人物真实地，具体地，活生生地描写了出来，时代与社会自然也就真实地具体地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①

他还声明：“我看小说，喜欢看人物……那种专讲故事，没有写出人物的，我私心甚至不承认它是真正的小说。只要人物写的好，我就评量它是好小说。”^②也就是说，通过人物的分析，把握人物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把握作品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点，才是吴先生人物研究的目的所在。

那么，怎样分析小说的人物呢？对研究者来说，也与创作者一样，需要有深刻的观察和丰富的阅历。吴先生在《如何创作小说中的人物》中说：“比如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这些，全凭客观的观察是不能有所得的，必须自己曾经有这些经验和体味。”^③只有具备这种条件，才能创造真实、生动的人物，也才能对此作入情入理的批评。吴先生在《读〈动摇〉》中就批评了这部小说对胡国光的描写“不近人情”，作者很不熟悉这样的人物，“只有凭了自己理想来乱七八糟的加以描摹”^④。相反，吴先生盛赞书中对方、陆、孙恋爱心理的描写，因为这样的人“在我们所熟稔的朋友中随处都是，有时或竟便是自己”^⑤。而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心理有独到的体味。此文作于1932年，后来，吴先生在进一步研究茅盾、鲁迅的小说以及阐释《水浒传》中林冲的转变、《红楼梦》中贾宝玉、薛宝钗等人的性格时，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对人物的思想感情与性格特征作符合生活逻辑的揭示。例如吴

① 《苑外集》，第34页。

② 《介绍短篇小说四篇》，《苑外集》，第204页。

③ 《苑外集》，第38页。

④ 《苑外集》，第182页。

⑤ 《苑外集》，第182页。

先生在《说〈离婚〉》中,就再次强调:

读小说,要看人物描写。一般的经验是,看人物的主次关系和性格特征、思想要点;看人物彼此间进行的矛盾斗争,他们所处的斗争地位以及性格矛盾的发展变化;还看作者透露的用心和爱憎褒贬的态度等等。再把这些方面的实质意义实事求是地寻思出来,归总到一起,就容易明白它的主旨,从而评量它的得失与高下。

他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对爱姑、庄木三、七大人等作了入木三分的解剖,不但使我们读懂了《离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开启文学宝库的钥匙。

重视文学反映时代与社会的使命意识、围绕人物、特别是人物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这一中心把握文学作品的精神命脉,构成了吴先生最基本的文学思想,这一思想既与吴先生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息息相通,又处处体现出吴先生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感悟,从而奠定了吴先生学术研究个性化的基础。

二 小说的读法与研究的重点

吴先生文学研究的重点在古代小说上。

从学术史看,近代意义的小说史研究始于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他们彻底扭转了自古以来对小说的偏见,使小说研究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这以后,孙楷第、郑振铎、赵景深、阿英等人,对小说史料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先生可以说是古代小说研究第三代的代表之一,他不仅对《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重要作品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也有整体的把握和论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着社会批评与艺术阐释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研究小说,首先要会读小说。时过境迁,人们对吴先生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些具体见解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吴先生通过他的小说研究所昭示的小说的读法,却依然有启发意义。概括地说,有以下几方面

最为突出。

一、如上所述,吴先生重视文学反映时代与社会的使命意识,因此,在古代小说的研究中,他也特别强调小说的历史感与现实针对性。他在评论一部作品时,总是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中去考察,指出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性格与当时社会现实的内在联系。他的《〈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就相当全面地阐明了吴敬梓的思想与明末清初新思潮运动的关系,作品的内容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也并非每个作家的创作都能达到同样的水平。因此,吴先生还注重分析作家的身世阅历、思想性格等创作的主观条件。他在考察了吴敬梓家庭破落和广泛接触士大夫的经历后指出:“没有这种占去他大半生的切身苦难经验,他不能有那种强烈敏锐的憎恶八股制艺、憎恶功名富贵的感情;更不能通过日常现象中的一些人与事,那样深刻地领会到那根源和本质——政治和社会的罪恶;也就不能有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他的这种对现实的态度和看法。”虽说用的还是知人论世的方法,探讨的问题和达到的高度却是前人所不及的。

在吴先生看来,古代小说的历史感与现实针对性,绝不仅仅是一种逝去的历史风景,其中还可能包含着与当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启示。因此,他的研究不仅仅着眼于文学,他还关注整个社会。他认为《儒林外史》的描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切身体验有某种相似性。他对《金瓶梅》等小说的评论也是如此,他认为西门庆是一个市侩的典型,宝钗身上也有市侩气。这种“利之所在,无所不为”的市侩气,是吴先生对中国社会特性的一种认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教条主义、信仰主义加市侩主义的恶性爆发^①。在这一意义上,古代小说就具有了借古鉴今的思想价值,而这既是古代小说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种现实关怀,也是一种审视作品的角度。

事实上,吴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都注重将古今打通,他在晚年曾写过一篇对话体的文章《关于现代派与现实主义》,反映出了吴先

^① 《苑外集》,第152页。

生这一老而弥坚、老而弥新的思想风貌。

二、吴先生的小说创作与研究都特别重视人物所反映的现实意义，因此，吴先生在揭示小说的读法和研究的重点时，也在人物及关系上大做文章。例如，针对《红楼梦》的研究，他主张：

我们研究《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的内容，正应该从人物形象的研究着手。研究众多人物主次从属的关系，研究众多人物形象的特征，研究众多人物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和彼此间的关系，研究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作者在处理上所表现的态度或爱憎感情等等。只有这样的来作研究，才能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他所反映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人物论在 20 世纪中期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研究。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存在不少不科学或者说违反艺术规律的现象。比如以人物为中心，吴先生认为当时很多人物论实际上是把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历史人物，在那里孤立地讨论人物的是非、善恶，忽视了这是艺术形象。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者的态度、注意作者是怎样描写这个人物的、他要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什么。如果我们把艺术形象当成历史人物，就将问题简单化了。

吴先生的长篇论文《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被推为“通过分析人物形象阐发《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解剖作者创作思想的拔萃之作”^①。在这篇论文中，吴先生从多方面对人物的性格及促成其形成的环境作了认真的考察。例如他客观地指出在贾宝玉的性格中，还有十足的贵家公子的恶劣作风。不过，他并没有停留在指出这一事实上面，而是进一步分析了这种作风的具体表现。第三十回，贾宝玉刚从与宝钗、黛玉的纠葛中走脱，又因与金钏儿说笑触怒了母亲，“在苦恼的心绪之上，又加上难忍的苦痛和不安”，以致误把开门的袭人当成那些小丫头们踢了一脚。接着，吴先生评论说：“这里贾宝玉爆发出来的恶劣的封建主义习气和意识，和他平日一般表现的思想性格正相矛盾，和刚才一路来

^① 刘梦溪：《红楼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88 页。

对女孩子所流露的心情也是严重地抵触的。这个骄生惯养、缺乏历练的公子,在刚受到一些切身挫折的特殊情况下,就不由自主地把他最坏的阶级本性暴露出来了。这是真实而且深刻的:这时处此具体情况下的贾宝玉势必会有这种表现。”这就从情节的整体关联中揭示出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又用人物性格的变化印证了作品情节的丰富内涵。

不仅对主要人物的分析,吴先生注重他们的人物关系、注重贴近艺术规律的把握,对一些次要人物,同样如此。吴先生另一篇堪称典范的论文《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也是以艺术创作的眼光来讨论小说中人物的设置与描写的。他指出,《红楼梦》开篇不是写贾、林、薛三个中心人物,而是写的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之前有过一个灵河畔神话说明宝黛的性格关系的“前因”。从神话写到现实就安排了甄士隐,让他联系那个超现实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同时又写了贾雨村,让他一头联系甄士隐,一头分别联系贾、林、薛三个方面。所以,甄士隐和贾雨村在开头是笼罩全书的主题思想,为准备开展悲剧故事而安排的两个人物。就贾雨村而言,作者安排他,就有多方面的作用与意义。这个穷书生原住在葫芦庙里,受了甄士隐的帮助,进京考上进士,升了县官,不到一年,却被革职。由此做了巡盐御史林如海家里的西席,这时恰好接到起复旧员的消息。林如海荐他找贾政谋官,同时让他带女儿林黛玉到外婆家去。这样,贾、林两个人就见面了。紧接着,写贾雨村因为贾政的帮助,题奏复职,选授了金陵应天府。一到任,就审理薛蟠为了买丫头,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的案子:于是薛家进京,薛宝钗也随母亲和哥哥住进贾家。而贾、林、薛三个人都会到一处了。在贾雨村先后“送”林、薛两个人进府和主人公会合的过程中,还就手分别介绍了贾、林、薛三家的家世和境况。

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对冷子兴的分析也很精彩。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通常被看做是作者介绍贾府的一种手段或角度。吴先生不仅注意到了这个陪衬人物的细微描写,而且注意到了他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那就是通过冷子兴与贾雨村及贾府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衬托贾府显赫的地位,揭露当时社会和政治吏治的内幕,而这些又是“构成贾、林、薛的在贾家以外的全面大范围的生活环境”的要素。

对刘老老的分析也是如此,吴先生指出,在贾府居于特殊重要地位的有两个人,一是贾母,一是凤姐,而刘老老前两次进贾府,既突出了贾府的生活势派,又分别对比了她们的性格。“贾母一贯把别人当做自己享乐装门面的资料。这次留住刘老老玩了几天,她就尽量卖富、卖贵、卖福气、卖能干、卖聪明。她得到最好的机会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取得异乎寻常的享受和快乐。”这种对人物言行与心理微妙关系的深刻分析,切中肯綮,令人叹服。比之当时学术界争论刘老老是不是劳动人民的问题,更符合艺术规律,因而也更符合作品的实际的思想内容。

通过甄士隐、贾雨村、冷子兴、刘老老等陪衬人物,吴先生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曹雪芹在人物安排上的艺术匠心。如此周密的分析,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是难以做到的。它不但对我们认识作品思想底蕴大有启发,对学习作品的艺术手法,运用到今天的创作中来也是不无裨益的。

三、由于吴先生从事过小说创作,深谙艺术规律,所以,他分析古代小说往往具有一种作家的艺术敏感,能揭示出人物安排、情节设置、细节描写的深隐内涵与艺术魅力。例如在《林冲的转变》一文中,吴先生就结合情节的进展,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林冲性格的发展变化。

除了精确地把握情节的流程,对具体细节的深入剖析,也是吴先生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过人之处。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这一论文中,吴先生指出,《儒林外史》“有许多生活细节,好像写得过于琐屑,但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内心深刻处,正从这些描写与刻画里透露出来”。他举了不少例子,处处表现了一个小说家对另一个小说家的会心。如对第二十八回乡里人诸葛天申不认识香肠、海蜇事,吴先生说:“这写的好像毫无意义。但试想想,就是这样一个香肠海蜇都不认识的老好人,有了二三百银子,却不肯在家好好过日子,一心带着钱到南京来,诚诚恳恳要找‘名士’选刻一部八股文章,带上自己的名,‘以附骥尾’,硬把钱给穷极无聊的萧金铉和季恬逸等吃个光:我们难道不觉得可笑,又为之惨然么?”这不起眼的细节很容易被我们轻轻滑过,甚至连诸葛天申这个人物也不会记得,但一经吴先生慧眼点出,我们确有一睹堂奥之感。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很早就形成一个以阅读为中心的评

点式的理论架构,金圣叹评《水浒传》,特意作了一篇《读第五才子书法》放在前面,用以统括散金碎玉般的评点。以后,毛宗岗有《读三国志法》、张竹坡有《金瓶梅读法》、张新之有《红楼梦读法》、刘一明有《西游原旨读法》,等等。这些“读法论”,与具体评点相互补充、生发,对阅读确实产生过引导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小说评点能附骥于小说、乃至成为书商招徕读者的一个招牌。但就总体而言,无论“读法”也好,评点也好,都不免零散之病,致使这一产生过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传统,在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冲击之下,几无立足之地。其实,作为一种批评方式、特别是作为以阅读为中心的批评态度与目的,传统的小说理论架构还是有存在价值的。而在吴先生的小说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对阅读的重视。他经常在论文中,指示小说的读法。不言而喻,他所说的“读法”是建立在新的文艺理论基础上的,因而具有更高的实践意义。如前所述,对《红楼梦》,他就反对只依靠作者在书中的主观解说和有心暗示之笔去做“研究”,而强调从人物的关系等具体描写入手。他还反对当时很常见的只摘取一些枝节的事项和细节来论断作品反映了怎样的思想的简单化方法,他提醒人们:

凡是阉割了艺术的生命,抹杀了文学作品的特点,那方法都是错误的。^①

原作者安排人物,都从整体着眼,摆在某一地位,赋予它必要的作用和意义。我们的评论,也应该从作品的整体、从全部关联上看它所摆的地位、所显示的意义和所起的作用,那才有意思。反之,说句笑话,比如我们若把人的鼻子从脸上揪下来,单独拿在手里,讨论这是不是个好鼻子,应不应该在上面戴副近视眼镜等等,这样的讨论自然没什么道理。^②

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吴先生结合具体情节,更明确而详细地总结了阅读时不可忽略的三点:一是书中所写每一场合的形

① 《说稗集》,第148页。

② 《说稗集》,第211页。